

1989年二月八日清晨，飛機降落在德國中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機場，我的小學同學侯子住在離此向北兩小時車程的杜伊斯堡（Duisburg），我告訴她不必來接機，我可以自己找到學校。其實我說這話是估計他們來接機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學校在法蘭克福南方又一小時車程的海德堡（Heidelberg），不好叫他們如此奔波。從小時候，母親常說一句話：「路在嘴裡」（意思是只要問路就可以找到路），我對這話深信不疑，往後的許多年，我就憑這句話走了許多陌生的地方。

我走出機場，找到開往法蘭克福總火車站的火車，一上車就被查票員罰款，原來是我坐到了「頭等車箱」，我很驚訝地發現如此「進步」的國家還把火車車箱分等級，後來才知道這種作法在台灣以外的地方是「通常」的現象。我由法蘭克福總火車站坐車到海德堡，在海德堡下車我問路到狼井小路（Wolfbrunnenweg），找到33號的公車，上了車我還問司機是否到狼井小路，沒問題。車子走了一段路，我直覺方向不對，到了一個山腳，司機停下來，並且幫助我抬下我的大皮箱，親切的指出一條向山的路。我拖著這個輪子故障的大皮箱向山上走，走了一百公尺左右，我掏出地圖研究，啊！這裡是 Wolfbrunnen（狼井），不是狼井小路，一個 Weg（小路）之差，方向完全不對。

我下山到馬路對面對去等一班回城裡的公車，上了車，等到車子開回城，我立刻拖著箱子站在下車車門旁，但司機為何不停車呢？我望著司機，他問：「你要下車嗎？」我終於知道下車必須按一個鈕，司機才會停車。我下來了，站在海德堡老橋的一端，前方是內卡河（Neckar），街上有一整排樹葉落光的白楊樹（Pappel），霧色迷濛，我被這麼美的景緻震撼了，一直到九月我離開海德堡，直到現在，這一幕停留在我腦中，是海德堡最美的印象，內卡河也成了永難忘懷的美麗河流。

路人告訴我只有坐計程車才能到達狼井小路，我站在路邊向過往的計程車招手，但沒有人停車，總算有一個司機停下來，他問我要坐車嗎？然後他要我站在那裡別走，他去替我叫車來，原來坐計程車要打電話叫的，我又學了一課。現在在台灣，坐公車想下車要按鈴，作計程車可以打電話叫，這些看似很簡單的動作，對於一個異鄉陌生人都是難關，感謝神，讓我度難關的時候還算年輕。

我終於到達學校「海德堡國際學習中心」（Internationales Studienzentrum Heidelberg），但是一進門他們就問我「妳那麼早來作什麼？」我還以為可以早幾天來適應環境呢？現在，我必須決定住在海德堡的旅館還是去找侯子。我找了一個很大的銀行，開戶存款，然後去火車站坐車，但是有一個問題很奇怪？為什麼我總是打不通侯子的電話。如果我搭了三小時的火車，花了台幣1760元的車資，到達杜伊斯堡還找不到侯子怎麼辦？

我疲倦極了，從台灣出發到現在就沒有睡過，我正逢生理期，並且一路上都在警覺和驚奇中度過，坐在火車上，實在想睡，但又害怕想像中的「壞人」，也害怕錯過下車的站，

我還要打起精神回答車箱中（每個小房間可坐六個人）別的旅客友善的問題。有一對老夫婦下車時親切地祝福我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順利愉快，他們的孩子在台灣。我在這段旅程中領悟了「天堂」的定義：天堂就是一個可以安心睡覺的地方。

天很黑了，晚上七點半我到達杜伊斯堡，我站在公共電話亭撥電話前懇切地祈禱上帝幫助我找到侯子。電話通了，侯子的先生董，他問我站在前站或後站，我不知道，他改問我現在看見什麼（感謝神！他真聰明），然後他說：「妳在那裡等，我十分鐘就到」。我一切的擔心、害怕，全部掃除。上帝！我找到了天堂。原來，我在德國其他地方撥電話的時候，不知道要在除掉德國代碼之後的號碼前面加入一個「零」，人到了杜伊斯堡，只撥他們家的電話，一撥就通了。侯子說她等我的電話等了一天，很替我著急。不能怪我，我第一次離開台灣哪！

侯子的家是我的天堂。我一躺就睡了一整天，接著的三天侯子費心地教導我各種生活須知，他們買了各式各樣的乳酪讓我品嚐，我真羨慕侯子流利的德語，也開始害怕我到了「考試制」為主的歐洲，對我這個不擅考試的人前途堪慮，但我已經來了。

二月十三日我回到海德堡，到校報到。學校安排我住在可以遠眺內卡河的大房間，後來才知道房間好壞是按年齡排的，我是第二老的，最老是老周，住在有浴廁的套房，但那裡沒有內卡河的美景。這個「海德堡國際學習中心」是一棟位在古堡後方的大房子，一樓有教室、行政處和餐廳，二樓以上就是學生宿舍，我住在三樓。

侯子交待我每天要看佈告欄，學校的通知是不會一一告知的，我每天早餐前一定去看佈告欄，沒有事公布時，我便可下山去認識環境和遊玩。每天都沒有事，直到二月二十日開始上課，吃完早餐，人人都去自己的教室，我傻傻地站在那裡，不知道自己是那一班，原來我在十六日下山找浸信會教會時，別人考了分班測驗，佈告是我們吃早餐時貼的。怎麼辦？校長看我學過德文，就把我帶到女老師卡特克（Kathke）的進級班。

在這個進級班我聽課好辛苦，天天都有考試。一星期後校長進來說我們班上有兩位同學成績不到進級班的程度，一個是越南女孩 Van，一個是我，但老師說我們很認真，因此容許我們留在進級班到復活節（三月二十六日），到時再作評估。班上的老周是上海外語學院的德文老師，她搞錯了，來了才知道我們的這學校的程度太低，不是她要讀的。老周上課時，沒有一個字說錯過，連卡特克老師都驚訝地說：「我沒有想到一個沒有離開過中國的人可以把德文學得這麼好！」同學大都二十來歲，只有我和老周年紀最接近，也談得來，於是老周就成了我的德文老師，上午卡特克老師教的內容有我聽不懂的地方，下午老周一講我就懂了，老周不只德文好，還很會教。我笑對老周說：「妳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共匪』。」，我叫她「大陸周」。我們一起分享生活點滴，一起找便宜的商店，一起走走逛逛。

復活節到了，我在大陸周的教導下趕上了進級班的程度，四月二十日大陸周轉學到

Erlangen 大學，大陸周不只像一個天使幫助了我，她改變了我的未來。人生的福禍相倚，無法視透，要不是有大陸周，我不會半年就通過大學德文檢定考試，但匆匆通過考試，不夠扎實的德文基礎使我的神學讀得很苦，很難得到學位，因為讀得不理想，而瑞士華人的福音工作又很吃緊，乾脆更努力於福音工作，造成我最後與同工們建立「蘇黎世華人基督教會」，留在瑞士幫助華人信徒。大陸周，我還是非常感謝她，也非常想念她。

在這段學習的過程，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每天看見別班的大陸同學擠在交誼室看電視，我實在沒有時間和心思關心，後來才知道事件的嚴重。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空白無知，後來藉著少數經歷過事件的朋友告知，才漸漸補了這片空白，但內心總不踏實，好像做錯了一件不能彌補的事，沒有在當時與中國朋友站在一邊。

就在這時，小學同學侯子學成要返台了，我去幫助她打包行李。侯子是學「教育」的，我抓住機會和她談談我的同性性傾向的問題，侯子看我夾在「傳道人」這個道德要求完美的頭銜和「同性戀者」這個被視為變態不潔的人之間掙扎，她對我說：「妳一定會精神分裂。」我說：「我不會精神分裂，我有上帝。」在內心我一點也沒有把握上帝將能怎樣幫助我，但我總認定自己是真心信上帝的，上帝不會棄我不顧。侯子返台了，留下許多東西送我，包括一輛自行車和一台彩色電視。

大陸周之外，還有兩個朋友是我非常感謝的。

在教會認識了洛特（Lotte），她是一位滿頭白髮的德國老盲人，編做刷子、掃帚為生，德國政府高價收購這些手工製品養活她。她沒有什麼朋友，有時醉倒在床無人聞問，每天政府會派人送中餐給她。我成了她的眼睛，帶她去過很多地方散步，和她在一起，坐電車、公車都免費，她成了我的德文老師，糾正我錯誤的發音和用字，我還學了盲人點字，把音樂會的節目表先打好給她，帶她一起去聽音樂會。我離開德國時，洛特很難過，後來我由瑞士來看她兩次，最後一次是 1992 年帶我的父母一起來看她，不久之後，她便去世了。因著洛特，我對盲人有特殊的感情，後來在我開設的希伯來聖經教室有兩位盲人同學跟著我多年一起學習，在中文研經禱告小組，他們感覺敏銳，能「看見」我們明眼人看不見的東西，而且他們兩人風趣和幽默，公認是我們這個團體中最快樂的人，我們原因何在，他們說「眼不見為淨」，哎！

海德堡的另一位朋友是開華人雜貨禮品店的女老闆劉姐，劉姐在海德堡的老街上開了一個小店，因為她也來自台灣，我常去看她，和她聊天。我先和她講好了，她的東西我覺得貴，我不會買她的東西但願意交她這個朋友。記得當我預備離開海德堡時，有一天我告訴她租車搬家好貴，她居然說：「妳不要租車，我叫我先生替妳搬家。」她先生也一口答應，上帝，太奇妙了，他幫助我搬一整車的東西到德瑞交界的羅拉赫（Loerrach）。更奇妙的事，多年之後，有一天我在瑞士接到她的電話，他們全家信耶穌了。上帝，你的恩惠何等奇妙。

大陸周走後，我成了卡特克老師最欣賞的學生，亞洲學生對老師彬彬有禮，服務周到，

很容易被老師喜歡。老師上課常鼓勵我，造句「自信心」時特別對我使個眼色，不然就用「浸信會」說個句子再對我偷笑。老師帶一盆海棠花放在教室，周末由我替老師照料，這盆海棠花長得非常茂盛，開了滿盆的花。大陸周的教導、老師的鼓勵、我的努力、上帝的幫助，使我在七月初通過了大學德文檢定考試，比我預計的提早半年。

暑假一開始，我參加州政府輔助的活動到柏林一個星期，全程不但免費，每人還送馬克一百元。「柏林」的確像個王者之都，令人感受到德意志的偉大，我們還去了東柏林一天，我誤打誤撞看了最值得一遊的「佩迦蒙博物館」(Pergamon Museum)，裡面有古代巴比倫的伊斯塔(Ishtar)城門、烏魯克(Uruk)神廟及亞述的雕刻。柏林圍牆也使我印象深刻，在那時，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個圍牆在過四個月就會倒塌了，每次再想到柏林，就體會上帝奇妙的愛，千里之遙帶領我去體會東西柏林和她們之間的圍牆，站在死難者的墓前沈思。人啊，何時才會看見「圍牆」造成的禍害，為什麼不能溝通？相愛？讓步？

暑假中我完成了一個壯舉，把自己關在海德保大學圖書館一個星期讀「交通知識」，我通過了筆試，得到了德國汽車駕駛執照。在台灣的媽媽在我考前作了一個夢，媽媽在信上寫：「夢見一棵美麗的樹，樹周圍發光，隨著從中間燃燒起來，最後從樹梢發出火光來，像枝大煙火，漂亮極了，一直喚妳爸趕快來看，被妳爸一推，夢醒了。將夢講給妳爸聽了，爸說，好預兆，妳考駕照一定會順利通過，那早晨爸媽為妳禱告，那天下午接到妳的佳音。我們實在高興，妳的前途會像那一棵發光的火樹一樣美，去照耀世人。」這張德國駕駛執照使我後來很方便的換了瑞士駕駛執照，但我在瑞士十年，沒有自己的車子，駕駛執照只能讓我幫有需要的華人朋友搬家，因為我會開搬家用的中型貨車。然而這個媽媽的夢景，常在我腦中浮現，尤其是2002年設立希伯來聖經教室時，這個夢激勵我像一棵「發光的火樹」照耀世人，把希伯來文教下去，傳下去。

美麗的故事背後，不為人道的難題就是我發覺自己非常迷戀卡特克老師。「我」還是一樣的「我」，我好不容易拋下了在台灣所愛的人，想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結果，我還是我，這實在是很悲慘的感受。卡特克老師在暑假請我到她家吃了一頓飯，飯後，我們一起騎自行車在鄉村繞，她教導我辨認不同的莓類，回來之後，我就每天想她。感謝上帝，我終究是必須離開海德堡，心中哼唱著海德堡的情歌名曲「我的心失落在海德堡」(Ich hab mein Herz in Heidelberg verloren)，我複雜的感覺無人能傾述。

現在來講講我是如何會去瑞士。

當我在復活節知道自己跟上了進級班，也感覺自己愈讀愈順，有可能一個學期就通過考試時，內心開始著急，再來要讀那一個神學院呢？我去拜訪了在海德堡大學神學院就讀的台灣同學，知道那裡有的教授信耶穌，有的教授不信。我怎麼能給不信耶穌的教授教呢？信仰越教越不信就完了。我寫信去漢堡的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回信說他們是屬於當地人讀書的學校，沒有教導外國學生的經驗，建議我連絡在瑞士的浸信會神學院。我寫信給瑞士的浸信會神學院，久久沒有回音。我向在台的老師和德國宣教士打聽，他們都

不贊成我去瑞士的浸信會神學院，因為那裡師資不濟且是用英語教學，若是去那裡，不如去美國。如此一來，我完全不知道再來怎麼做。

壓力太大，每天清早六點我就起床到古堡花園，我在那裡高唱讚美詩，給自己打氣。「祂藏我靈魂，在磐石洞穴裡，如乾渴之地得蔭庇，祂藏我生命，在祂大慈愛裡，用祂全能手來扶攜，用祂全能手來扶攜。」這些歌詞使我清楚的感受上帝同在的證據和他的安慰。我從來沒有像那時，深深經歷「單單仰望神」，在我擁有許多的時候，我不可能學到單單仰望神。我感謝上帝給我這樣的經歷，只有上帝我可以仰望。

這樣歌唱約三個星期後，四月十九日我突然收到一封瑞士寄來的信，我不認識寄件人。這位簡先生寄來了一個瑞士神學院的資料，當我看到這個學校的課程：第一年「希臘文」「希伯來文」、第二年「希臘文」「希伯來文」，每年都要學這兩個語言，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就是我要的。「巴塞爾自由福音神學院」(Freie Evangelisch-Theologische Akademie Basel 簡稱 FETA，因「自由」易被人誤解為神學思想自由，現已更名為「巴塞爾不屬國家教會的神學高等學院」Staatsunabhängige Theologische Hochschule 簡稱 STH)很快的回覆我的申請，接受我入學，我原文根基太淺，自願由大學讀起。後來知道 FETA 是德語神學院中對聖經原文要求最嚴格的學校。這位簡先生原來是以前和侯子同教會的人，被經濟部派在瑞士工作，他聽侯子提到我，因瑞士沒有懂華語傳道人，他想盡辦法為我找學校，「設計」我到瑞士去。三年之後，簡先生成為「蘇黎世華人基督教會」章程的起草人，我們和幾位同工一起建立了瑞士第一個華人教會。神的作為何其難測！奇妙何其難名！

學校是有了，下一步就是「瑞士簽證」。

我很積極的預備了所有的資料向瑞士在司徒加特 (Stuttgart) 的領事館申請簽證，他們說大約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我估計絕對來得及。我又向學校申請暑期住校，也通過了。當我很充實地過完七、八兩個月，仍然沒有簽證的回音。有一天學校校長找我，她告訴我「九月十一日」必須離校，我急著要求她讓我再等幾天，我孤單一人在歐洲，無親無友可以依靠，在外短期租屋也很困難，我聲淚俱下地拜託她，她還是說沒有辦法。我的個性可能像彈簧，被壓到底時會跳起來，我突然振作地對她說：「我回去禱告上帝。」就離開校長室。

六神無主地回到宿舍，正想大哭一場，聽見敲門聲，是伊朗同學約我去爬山。哭也沒有用，去吧！當我們走上五百公尺高的學校後山，各種顏色彩繪的山巒橫在眼前，繽紛的秋景使我驚嘆得感動：「創造這一切的是天父，我的父親，他豈不會為我預備住處呢？」愁煩一掃而空，轉而積極地打電話連絡。在台灣的德國宣教士洪姐建議我去找住在羅拉赫 (Loerrach 德瑞邊界的德國城市) 的富勒 (Fuehre) 夫婦，他們的女兒在台灣當宣教士。我惶恐地寫信給富勒夫婦，不久收到他們的回信，一打開信，看見信尾署名「妳的爸爸和媽媽」，我感謝萬分。信中告訴我，他們非常願意幫助我，但是他們的房子不夠住，我被安排住在他們的朋友歐司娃 (Oswald) 夫婦家中。富勒夫婦對孤立無援的我伸

出溫暖的手，他們兩人的恩惠我難以忘懷，在瑞士巴塞爾的那些年，我每年都會去探望他們，後來去了蘇黎世，因簽證困難，去的次數就少了，離開歐洲前想再去，因為瑞士的工作已經辭去，德國政府怎麼都不願意再給我簽證，可惜無法道別。富勒夫婦現在均已已經在天家安息。

九月十一日雜貨店老闆娘的先生林博士幫助我搬家，侯子已回台灣，我收到她大批文具，加上電視，和我新買的打字機和棉被都裝上了旅行車，腳踏車綁在車外。再見了！海德堡。車行三小時多，到達羅拉赫，先把一些東西放在富勒家，我搬入歐司娃家。

歐司娃夫婦也信耶穌，沒有子女，丈夫叫艾米爾（Emil），八十歲、跛行；太太叫路得（Ruth），七十五歲，她的第一任丈夫曾在中國上海工作，後來因病去世，她又嫁給現在的丈夫，因此她對我特別友好。歐司娃夫婦是住在羅拉赫郊外的小村莊好因根（Hauingen），安靜優美，背後就是黑森林。路得說「黑」森林是因為針葉茂密，走入樹林伸手不見五指，所以叫「黑森林」。路得教導我許多植物和蔬果的名稱，也教我許多生活常識，做德式優格（酸奶）沙拉，和他們在一起非常愉快。在我離開他們的這十多年，路得每年都親手作生日卡片寄給我，為我禱告。艾米爾和路得分別在 1996 年和 2007 年去世，直到今天，路得的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書架上，感謝上帝給我這個好媽媽關愛我。

原本說好住一至兩星期，但兩星期過去了，仍然沒有收到簽證。十月六日下午六點必須到神學院報到，學校的秘書三兩天就打電話來問，因為我還要在瑞士找房子，時間緊迫。簽證！簽證！簽證！簡直逼死人了。十月二日晚上當我如常的為「簽證」向神迫切禱告時，有一節經文在心中出現：「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六章 33 節）我停下禱告，心裡想「我禱告求簽證求了兩個月，難道都錯了，我應該『先求神的國』！」我再開始禱告，求神赦免我，我也不明確知道什麼是「神的國」，我向神說「主！我對瑞士的華人福音情況一無所知，我願意為你向他們傳福音，我的簽證我不必求了，你會給我的。」很奇妙！好像一個很重的東西從心裡掉下來，我的重擔完全沒有了。隔天，我高興地告訴歐司娃夫婦「星期四上帝將給我簽證」，他們不相信地看看我，可能覺得我想簽證，想得過多了。

星期三我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覺得這像一場戲，我以前一直以爲自己是主角，我的簽證，我的簽證。現在，我變成是觀眾，上帝是導演，我看上帝如何導演這場戲，星期五必須到校報到，星期四我一定會拿到簽證，還要在瑞士找到住所。」

星期四早上吃早餐時，我對上帝說：「今天星期四，等會兒十點鐘郵差要來，你會給我簽證，你會幫助我找到房子。好戲就要上場了。」我不知道這篤定的信心是怎麼有的，但我就是知道，上帝一定成就。果真，一切都如此發生，當郵差按門鈴時，跛行的艾米爾跑得比我還快，司徒加特瑞士領事館來的信，簽證！下午，我騎自行車，二十分鐘就進了瑞士，再騎二十分鐘就到了我的學校，秘書說她知道我來不及了，她已為我找了一

個住所。她帶我去看未來的住所，一個好大的宅院，三層的洋房，見到未來的房東胡伯（Huber）太太。胡伯太太領我看整個房子，我根本無心看房間，只怕租金很貴，結果每月才兩百元，便宜極了！大約只有別人的半價。

感謝上帝！十多年後，路得提起這件事說：「妳拿到簽證的事，對我們大半輩子的基督信仰是很大的震驚，我們沒有想到上帝這樣作事！」我永遠忘不了「Visum」（簽證）這個德文，和這個奇妙的經歷。「先求神的國」，上帝早已預備了，又有誰能預料到一個月後我就在「巴塞爾華人基督徒團契」帶領查經，並關心他們。一年之後，我開始協助「蘇黎世華人基督徒團契」的講道和探訪，三年之後，「蘇黎士華人基督教會」被建立，我成爲瑞士第一個華人傳道。

在這一切很屬靈的事後面，有一些東西是我沒有想到要對付的。一個是我對卡特克老師的想念，一個是我無意之間看見全裸的電視鏡頭。經歷屬靈的事，不一定是屬靈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軟弱和剛強，但上帝看我們就是用愛。

爲保障相關人的隱私，自傳中更改某些姓名，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欲知後事，請繼續看「青年時期 IV」，謝謝您。